

GHUAWENXUESHILIAOZHONGHUAWENXUESHILIAO

ZHONGHUAWENXUESHILIAO

中華文學史料

中華文學史科學學會編

百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史料

(一)

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編

百家出版社

本书主编 马良春
陈伯海
副主编 胡从经
徐乃翔
执行编辑 胡从经
夏咸淳
陈育生

中华文学史料(一)

中华文学史科学学会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6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80576-118-3/1·42 定价: 2.90元

“中华文学史科学首届研讨会”开幕词*

——代发刊词

马良春

“中华文学史科学首届研讨会”经过同事们的努力筹备，现在终于开幕了。这次会议，参加者有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将共同研讨文学史科学的建设问题。这至少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把这次会议说成是我国学术界有意义的一件事，我想是不算夸张的。

中华文学源远流长，文学史料浩如烟海。做好文学史料工作，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而这浩如烟海的史料，又是纷纭复杂，真伪相掺，更给发掘、整理工作增添了困难。我多次引用过冯友兰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说：历史有“历史”和“写的历史”之分，“历史”只有一个，而“写的历史”会有很多很多。很显然，冯先生所说的只有一个的“历史”，是由确曾存在过的事物所构成；而“写的历史”则是后人对“历史”的描述。由于修史者对确曾存在过的事物掌握的程度不同，也由于修史者认识上存在差异，出现“无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写的历史”，就在所难免了。尽管如此，“写的历史”之是否具有科学性，终究要受只有一个的“历史”的检验。不言而喻，作为称得上治史者赖以立论的基石的史料，必然是文学史上客观存在过的、真实可靠的材料。而修史者对真实的史料之追求和掌握，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诚如梁启超所说：治一学，第一步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白，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将此论说用于治史方面，这里所

* 这里发表的是当时讲话的节录。

说的“真相”，即真实可靠的史料，掌握“真相”是治史的前提。毫无疑问，离开了前提，不论是谁都无例外地要失去批评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召开这次会议，可说是为了磋商探求历史真实和如何探求历史真实的会议。

我深以为，现在来强调史料工作是有现实意义的。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中，已有一大批致力于史料工作的，似乎可见一支队伍的雏形；文学史料性书籍的出版也日见增多，显示出多方面的实绩。学术界为探求提高研究水平，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各种宏论，各种实践，都从不同的意义上能给人以启发。这是令人欣喜的一方面。但同时还应看到史料建设工作上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冷静细察起来，种种差错和不良现象也实在不少，有多少论者，或因史料掌握的贫乏，或因史料掌握的失误，或因忽视乃至将史料看成与作文章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使自己的文章漏洞百出，空话连篇，毫无实际意义。至于抄袭剽窃，断章取义，轻率结论等等空疏浮躁的不良学风，也时常可见。不可讳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只能给史料工作的健康发展造成阻碍。

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史料工作健康发展，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其一是丰富史料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史料学作为一门学问，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历来热衷于这门学问的大家，都从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作了重大的贡献。诸如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等等，都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从事史料工作的人也是应该熟悉和掌握的。从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到章学诚的“四长”之说，都可谓为从事者树立的严格的条件。我们今天也应该用这些条件来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史料工作具有科学性和应用性。

其二是树立良好的学风和严肃的治学精神。没有严肃的治学精神和良好的学风，很容易使治学走上空疏浮躁的歧途，或是热衷于蹈袭别人的成说，或是心以为然地妄加论断。采取唯心主义的

形而上学的态度,将本来是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演释成对立的、互相排斥的关系,时而走这一极端,时而又走另一极端,其于治学的危害尤为不容轻视。近几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学术界在热心于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思潮与方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方法轻率地采取一概排斥乃至全盘否定的态度。即使单从治学角度上说,这也是不足为取的。其实,我国近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都获得了程度不同的科学认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新人自不待言,连晚清的梁启超在考察近三百年的学术演进后,也写成了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仍然是不无教益的。比如,他认为我国文化史是确有研究价值的,“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梁启超具有严肃的治学精神,对学术发展有高度的责任心,因此他很注意学风问题,他说:“将现在学风和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如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梁启超的这些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

其三是明确史料工作的目的。文学史科学虽然可以独立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但它又不能也不应当脱离文学史学,因为它的存在说到底还是为文学史的研究服务的。也就是说,文学史料的搜集、研究和纂辑,无不是为探求文学史发展规律提供可靠的依据。毛泽东说过,研究问题,应当“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是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当中有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也有目的问题。明确史料工作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强调史料工作的结果,很可能又出现为史料而史料的偏向,从而使史料工作带上盲目性。

为了更好地开展和推进我国的文学史料学研究,我于1984年曾在—篇呼吁加强史料工作的文章中,建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科学学会。这一想法,几年来得到海内外同行们的赞同和支持。现在正在酝酿成立的学会,比我先前的设想范围扩大了,不仅仅是现代文学,而且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还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因此,我们拟将学会的名称定为“中华文学史料科学学会”^①。这个学会的成立,首要的任务是对于史料科学本身的研究,并将定期召开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推动文学史料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理论著述的产生。学会的成立,必定会对文学史料工作者的团结与交流,对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对文学史料科学的成长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

与筹备成立“中华文学史料科学学会”的同时,一些同志正在为创办将来作为会刊的《中华文学史料》丛刊而努力。首先给予这个未来问世的刊物以最有力支持的是钱锺书先生,他热情地为刊物题签,这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关于这个刊物的宗旨,在讲了上面一些话之后,我现在反倒觉得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的了。只是希望它问世后,能在海内外同行们的不断关怀和爱护下,为提高文学史料和文学史的研究水平,为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次中华文学史料科学研讨会既然称之为首届,就意味着将来要不断的召开。我相信,首届研讨会一定会树立一个好的开端。希望与会的同仁们共同努力!

1988年10月11日

① 该会现已正式成立。

目 录

中华文学史科学首届研讨会开幕词

- 代发刊词…………… 马良春 (1)

文学史科学论坛

- 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 孙玉石 (1)
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卢玮銮 (10)

文学史专题资料

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

- 关于赵南公 1921 年日记的
研究报告…………… 陈福康 (25)

佚文钩沉

- 采录小说史材料书目…………… 鲁 迅 (56)
李伯元重要佚文新发现
——证实《海天鸿雪记》非李之作…………… 祝均宙 (59)
黄遵宪的集外词…………… 赵慎修 (66)
在柘园中徜徉的郁达夫…………… 胡从经 (69)
P.K. 笔名的重新考证和
《孤吟》上的巴金早期作品…………… 张 伟 (87)
冯至佚文一束…………… 冯 至 (94)
关于冯至佚文的通信和说明…………… 冯 至 陈永志 (113)

作家研究资料

张岱年谱简编..... 夏咸淳 (115)

“竟陵派”同志录..... 郭国平 (126)

文学期刊经眼录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 南 溪 (134)

考证·辩证·订伪

《文镜秘府论》所载初唐声律、病犯及诗体

资料之解说..... 杨 明 (154)

“松江”的移名与“鲈乡”的专属

——从《后赤壁赋》“松江之鲈”说起

..... 李国平 王尔龄 (170)

手稿·版本·图录

《刘子》写本·钞本考索..... 林其铤 (175)

书目与索引

中国现代诗刊目录..... 柘 园 孙 珊 (189)

学会动态与文件

中华文学史科学学会在京成立..... (196)

中华文学史科学学会章程..... (197)

中华文学史科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200)

*
*
*
*
*
*
*
*
*

文学史料学论坛

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

孙玉石

现代文学史料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辨伪与考订，不仅在于完成自身系统工程的建设，更重要的，我认为，是如何发挥史料建设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科学化的调节机制。没有完整史料建设基础的理论是残缺不全的理论。同样，没有理论升华的史料建设也是没有完成的史料学。史料学应该尽到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的责任。

发挥史料建设在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中的调节机制，主要表现为如何让史料在理论研究迈向科学化的进程中，起到应有的促进与制约的作用。

一、近年现代文学史理论研究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的几种主要趋向。

理论的开放与思维的创新，正打破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格局与方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些富于理论创造性的成果，显示了他们具有充分的史料准备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但是，一些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由于种种原因，忽略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忽视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性，在研究中出现了几种值得注意的趋向。

1. 空疏性。近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可喜的现象是宏观性理论研究的突破性发展。伴随这种趋向而产生的是一些文章理论

的空洞。读了之后觉得很多立论与观点有震悚一时，耳目一新之感，仔细推敲却感到不那么扎实，水分太多。有的甚至漏洞叠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研究者离开了一般文学史研究的客观规定性，不从大量史料的阅读调查中抽象出规律性的观点，而是相反，先以一些哲学和美学理论为启迪，靠一些思想的火花来构想自己的理论模式，或搬用一些现成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然后再找史料来论证，有利于论证者则用，不利于论证者则舍，而对于这一理论模式在文学史发展的事实中有多大的覆盖率，却考虑较少，或不予考虑，只求轰动一时，不求科学与否。新颖几乎成为唯一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你批评它缺乏科学性，他们就说你是“守旧派”。

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浮夸的学风。要改变这种学风和理论思维的趋向，当然不能依靠理论的压力和权威的表态，而要靠科学的理论来论证和商讨，靠科学的研究学风来引导。科学的论证和科学的学风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如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是否存在一个完整的思想批判模式，不能靠一个人物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侧面的言论，而要考察一个人物的全部或各个侧面的论述，还要考察同时代其他人物的言论主张，从中加以准确的科学归纳，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能以自己的理论模式强加给一个历史人物。不管这一模式是否正确，是否科学，只能从大量的历史材料里抽象出理论，而不能用既定的理论模式去套历史。又比如，对文学史现象的总体特征做宏观的理论概括，可以大大拓宽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与观察视野，甚至会冲破已有的理论格局，引起人们更宏大的思考。但这种总体特征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以大量的作品和理论现象做为抽象的依据。这里就有一个定量的史料分析问题。如果一个总特征对历史现象的覆盖率不能超过多数，那么这一概括就很难说是科学的。任何理论概括不能以牺牲多数的历史事实为代价，即使概括总不免会有牺牲。

有一种观点我不能赞同：即认为靠史料进行文学史的研究是

一种落伍了的陈旧方法。不看材料不写文章是一种“爬行主义”。问题在于写什么样的文章。文学批评可以不看更多材料。只要找来作品本身就足够了。但是这作品本身不也是一种对象化了的材料吗？更何况能够写出好的有见解的文学批评主体本身，就已经是看过很多“材料”才积累了自己的感受、鉴别与批评的能力。而作为文学史研究，就更有它的特殊的不同于文学批评的性质。离开历史的资料进行理论抽象几乎是不可能的。钻进史料堆里抽象不出理论当然是“爬行”，离开了史料就大而化之的概括这种“飞行”也并不可取。忽视了理论研究中科学化必然受史料的制约，结果丧失的只能是研究的科学性。

2. 随意性。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时代气候影响和主观意识的参与。近年来一些现代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摆脱了左的思潮的阴影，对许多历史现象、作家作品，作出新的评价，新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转变。它预示着现代文学史研究必将出现一个总体性的突破，进入这一学科领域更高的科学化的层次。西方各种批评方法的引入，也是对文学史研究一种巨大的冲击。一个重要表现是，理论研究力求摆脱过分拘泥史料的沉重束缚，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在批评研究中的作用。这种努力带来了一些簇新的成果。对于史料的沉醉与拘泥，结果是理论生命的丧失。丧失了理论研究的创造性也就没有什么科学性好谈了。但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意识能动性是无限的，而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本身却是有限度的。这限度就是对作品及其他史料客观性的尊重。有些研究者不是从史料（包括文学作品）升华出观点，而是让史料仆从于观点。文学作品和文学史料，成为自己理论观点任意宰割的奴隶。如有的文学史专著论述胡适的时候，引述了他的刊载于《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一段话论道：在介绍易卜生的“问题剧”时，片面地把易卜生说成是“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不大讨论政治问题”，使话剧脱离当前斗争，并乘间推行他的“实用主义”和“真正的纯粹的个人主义”。但是，胡适《易卜生主义》中原话

却是这样的：“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要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这段话经研究者随自己观点的需要拦腰截断，就完全成了相反的意义了。胡适称赞易卜生让社会容忍鼓励敢与社会腐败斗争的人物，变成了胡适鼓吹易卜生“要社会极力容忍”了。有的研究者在挖掘一部作品的深层意义时，把战争造成科学至上主义的悲剧，说成是不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更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不能保护自己民族的精英，给他们以起码的创造性劳动条件的悲剧，一个文明暂时无力战胜“愚蠢和野蛮”的悲剧。这样的“开掘”，引用的仍是原作者对作品的说明为依据，而对说明的原义，已经作了不尽符合原意的理解和摘引。《野草》中《墓碣文》一句话：“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有的研究者在这里看见作者的虚无主义思想，有的研究者在这里看到作者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思想。差异极大。

上面的例子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完全是断章取义，或未认真读懂材料即加以引用，作为服务于一种既定理论观念的例证；有的确有学术上新的开掘，但囿于一种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或对文学母题总体的思考，将原作精神作了某种扭曲，以便纳入论证自己观点的轨道；有的作品本身即有模糊性，允许理解上歧义的存在，但有的理解却带有更强的主观需要性，以一概全，或以一代全。不同的情况，却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存在两个片面性：引述的片面性与理解的片面性。我们要研究文学史，要评价作家和作品，就要尊重史料或作品的整体性和客观性，对史料与作品作全面的引述和正确的理解，史料的研究整理要起到一种制约作用，这样，才能避免一些理论研究的非科学现象更多的发生。

3. 因袭性。现代文学史料，包括作品、论述等资料，都有一个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和经过整理筛选的第二手资料之分。论述一篇作品，研究一个作家，探讨一个理论问题，都必须多看原始的材料，

不能只靠选本，靠后来的集子。而这种不看第一手材料的因袭力量在研究者的身上往往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学问，写文章要轻易便捷得多。1979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女神》的文章，提出依靠修改过的本子来论述郭沫若的思想与精神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顺便谈及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小问题，即多看第一手材料，多读一些原版书和原始期刊的问题。但是不久有的同志批评我的一篇论郭沫若文艺思想的文章中，引述《文艺论集》的话，就依靠的是全集，而不是原来的版本。匆促成稿的积习，使自己又掉进了自己批评的“怪圈”。

近年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重视了这个问题。许多史料的基本建设也为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急于渴求出成果的匆忙，或者因袭性力量的支配，忽视了对原始期刊的查阅，忽视对原版本作品的阅读，甚至忽视了对已经阅读到的史料的细心审视，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非科学的论述，一些不应有的毛病。

《雪峰年谱》和《雪峰文集》都注明《结论》一文原刊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27年3月10日），但查阅原刊该期却无此文。这篇文章原来发表于1927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上。原文题目不是《结论》而是《一篇草稿》，署名也不是画室和雪峰，而是“木荳”。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即使花了很多工夫完成的著述，我们也不能放任自己因袭的惯性，而应动手去查阅原来的文学刊物。查阅原刊，不仅可以避免一些研究的错误，甚至会有所发现。看《莽原》，发现了上述问题，补充了一个笔名的阙如，而且发现了雪峰几篇文章与文集上的比较，有许多重要的修改的差异。进而翻阅《语丝》，又发现了被人们长期忽略而淹没了六十年的一篇很有价值的杂文。如果放任因袭的惰性，对一些作品或其他史料陈陈相因，就可能让错误的东西一再延续。梁宗岱的《晚祷》（二），《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副标题为“呈敏慧”其中有四行诗是：

我只含泪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红
给春暮阑珊的东风
不轻易地吹到我的面前；

香港张曼仪先生等编的《中国现代诗选》一书依据的也是朱自清的《大系》，我读这第四行时总是弄不通“轻意”是什么意思，借来《晚祷》1925年3月的商务印书馆的初版本一看，原来“不轻意”是“不经意”的误排，这样意思才通畅了；且发现两首《晚祷》，第二首并无“呈敏慧”的字样，只在第一首下有副题“呈迅捷二兄”。朱自清先生依据的蓝本究竟是哪一个？这又成了新的问题。一篇文章带如此，一句话中的一个字如此，有时忽略了一个标点符号，也会来理解的障碍而造成误失。如有的研究者对卞之琳《尺八》的解释，因为一句诗在选本中误为句号，加上研究者读另一篇说明散文《尺八夜》的粗心，以致造成对诗中抒情主客体的误解，把当年在长安“独访取一只凄凉的竹管”的番客（日本人）看成了写诗的时候在东京买了一只尺八的诗人自己。三个例子说明，理论研究对史料的依赖，最重要的还必须注意克服研究者本身因袭的惰性，舍得花时间精力来掌握第一手的材料。稍一疏忽，稍一降低了要求，就可能出现论证的差误。

二、史料建设如何成为调整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的趋向。

发挥史料在理论研究中的调节机制，我以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加强史料学的建设，促使现代文学研究队伍树立一种科学的史料观。要珍惜这几年现代文学理论深化突破的成果，使这支队伍健康的发展，从史料学角度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给研究者引入一种科学的史料观，改变对史料轻视的不正确观念，在理论研究中逐渐树立起科学的学风的威力和影响。重建一种扎实的学术风气是艰难的。特别是在众人趋向理论创新

模的空气下,通过批评研讨和典范实践,促使一些热衷于炮制理论式的研究趋向更多地注重史料对理论的规定性和制约性,将科学的史料观与理论创新的勇气结合起来,现代文学的理论研究才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次,要努力实现史料向理论的能量转化。建设史料的系统工程,发掘和整理更多的史料,甚至建立现代文学的史科学等,都不是唯一的目的。重要的方面是要发挥史料在深化发展理论中的作用。过去往往存在着双向的轻视现象。搞理论研究的轻视从事史料工作的,搞史料建设的不关心理论研究的苦衷。而后者,更为值得我们史料建设者自省。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打破史料型研究者对于理论型研究者的冷淡与漠视。史料如一堆开采出来的原煤,要使它发生多种能量的转化,就应该把史料的触须伸到理论研究的广阔领域,不仅沟通两者之间的渠道,还要更大的发挥史科学对于理论研究科学化的监督促进的职能。中国古代就有史辨的传统,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就是这一传统在现代的继续,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近年朱正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经过详细的考证,纠正了包括许广平的回忆在内的许多回忆录的错误,做了一番认真扎实的工作。但是过多仍是史料学者对史料本身的批评多,对理论研究的批评少。二者中间总是隔着一层。我以为要打破这种隔阂,理论研究向史料领域扩大他们的需求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要史料工作者加强对理论研究成果的关注,逐步建设与开展史料与理论研究之间对话的空气,使理论研究接受史料研究者的冲击,以丰富和校正自己,同时也给史料的整理与挖掘输入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和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一种和谐的供应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第三,建立史科学的必要阵地,担负起从史科学的角度对理论研究批评的职能,不断的实践中建立史料批评学。也可以叫文学史料批评学。目前有些史料性的刊物,刊登的长篇回忆录文字过细,水分过多,已失去史料的可信性,迹近文学创作。有些史料

散见于一些刊物，不易凝聚人们的注意。而关于从史料学进行批评的文章更少发表之处。这同我们对史料学职能的观念认识有关，以为这是一种多管闲事的“越位”，也同时受制于学术研究不正常的风气，缺乏乐于接受批评，乐于别人挑剔自己文章史料运用错误，特别是被指出硬伤的气度，批评者也视而说不说，怕由此引起人们“挑刺儿”的指责。郭沫若研究金石甲骨的文章著述，有很年青的同志同他商榷，指出了他的误解之处，他写信鼓励青年同志对自己的批评。现在承认或愉快地接受这种“一字之师”的批评的风气太淡薄了。许多书评成了礼赞的颂歌。最多有一点不痛不痒的“但”笔做轻描淡写的尾巴。我们理论研究者之间，理论与史料研究者之间充溢着一种君子气，同创作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相互捧场的哥儿们义气一样，是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很有害的。办史料学的刊物，一个重要的职能，就要打破这种不正的风气，建立一种正常的批评与研讨的风气。

为此，史料学的刊物，不仅要注重史料自身的价值，还要更大的开掘史料在理论批评中的潜在价值。以有说服力的，有实事求是之意，而无哗众取宠之心的一批又一批文章，来实践史料批评学这一方向。在自己的刊物上，要敢于发表一些专从史料角度“挑刺儿”的文章。这些辨正性的“挑刺儿”，对于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文章，无损其自身的价值光辉，而对于忽视史料或歪曲运用史料的风气，却可以起到一定牵制作用。波及之余甚至会影响一代青年学子的学术作风。史料学如果埋头于自己的发掘与建设，放弃这一职能，只能变成一门残缺不全或者为史料而史料的畸形的学问。史料学的建立应该走出自己的起点，开拓更宽的路子。现在办企业有一个跟踪服务的问题。我理解这个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要适应不同的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系列；一是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实行上门调试维修。这种跟踪服务的制度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得到了双重的效益。建立史料批评学，就需要有这种跟踪服务的意识，史料工作者与理论研究者之间建立这种